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4 年 11 月第 6 卷第 11 期

大学生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干瑜璐　陈曰鑫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舟山

摘　要 | 目的：了解大学生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的关系及其相关因素。方法：以1532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回溯版）、自尊量表、“躺平”量表分别测量大学生的负性情绪、校园欺凌经历、自尊水平与“躺平”水平。结果：校园欺凌经历得分与负性情绪得分呈正向关联；自尊得分在校园欺凌经历和负性情绪得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的大小为0.07（95%CI：0.05～0.09，$p<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4.58%；“躺平”得分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得分、校园欺凌经历与自尊得分的关系中均起调节作用 。结论：自尊在校园欺凌经历对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躺平”调节了校园欺凌经历与自尊、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 校园欺凌经历；负性情绪；自尊；“躺平”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处于青春期到成年期过渡阶段的大学生，在当今节奏快速、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面临着学业、就业、人际关系等多重挑战，这些挑战往往伴随着负性情绪的产生。负性情绪（Negative Emotions）是指个体一种主观体验到的情绪低落和不愉快，主要包含了抑郁、焦虑和压力三种情绪[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22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21.4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抑郁风险，45.2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焦虑风险。在不同国家的大学生群体中，抑郁、焦虑和压力的发生率均处于中高水平[2-4]。抑郁、焦虑、压力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如果长期不加以疏导，可能会导致大学生的辍学率提升、自杀倾向增加、人际关系受损等[3]，从而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研究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深入了解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可以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应对负性情绪，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一项针对欧洲7国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18.20%[5]，在我国10～18岁的青少年中，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13.13%[6]。校园欺凌虽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生率存在差异，但它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普遍

基金项目：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ZX2024038）。
通讯作者：干瑜璐，硕士，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学校心理健康。
文章引用：干瑜璐，陈曰鑫. 大学生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中国心理学前沿，2024，6（11）：2183–2189.
https://doi.org/10.35534/pc.0611245

存在。校园欺凌指的是以校园为背景发生的欺凌事件，它包含了身体、言语、关系及网络层面的攻击，如肢体上的推搡、言语上的嘲笑、社交上的排挤、网络中的攻击等[7]，无论何种层面的校园欺凌都会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的后果。在中小学生群体中，遭遇校园欺凌的学生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孤独等负性情绪[8-10]，更容易出现逃课、辍学等现象[11]，甚至更容易出现自残、自杀等行为[6, 12]。在大学生群体中，遭遇校园欺凌后更容易出现情绪障碍[13]。尽管校园欺凌大多发生在儿童期和青少年时期，但它造成的心理影响会持续到成人阶段。研究指出，曾遭受过校园欺凌的人在成年后也会表现出更低的情绪调节能力、更低的生活满意度和更高的社交焦虑等[14, 15]。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大学生的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存在正相关。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我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是个体对自我意义和价值的综合评价[16]。根据罗森伯格的观点，自尊似乎在儿童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构成了自我归因的基础，即一个人以有意义和令人满意的方式与他人联系的程度[16]。研究表明，校园欺凌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遭遇过校园欺凌的人更容易出现低自尊[17]，而低自尊可以显著预测抑郁、焦虑、压力等负性情绪[1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自尊在大学生的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间起到中介作用。

“躺平”是指部分青年人在“内卷”的社会中，当所承受的压力突破个体心理临界时，选择放弃努力、消极逃避的精神或行为状态[19]。体验回避模型（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认为，不愉快的事件会引发个体产生不愉快的内在体验，这种体验让个体痛苦，因而会想要逃避或者回避[20]。根据存在主义理论，人生来就渴望找到生命的意义[21]，而长期“躺平”可能会导致个体的无意义感，从而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怀疑[22]，进而降低个体的自尊心。此外，“躺平”与负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23]，即越倾向于“躺平”的个体存在的负性情绪越多。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躺平”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自尊及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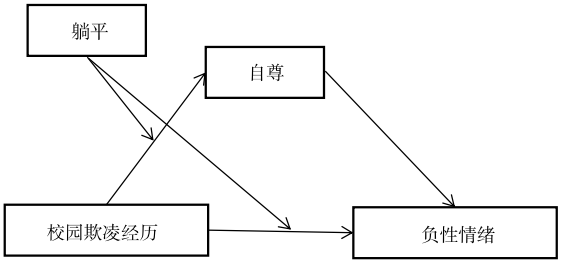

图 1　假设模型图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hypothetical model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公式$N=\frac{Z^2\times[p\times(1-p)]}{E^2}$计算样本量。其中$N$为样本量，$Z$为统计量，$E$为误差值，$p$为概率值。

本研究中，Z=1.96（置信度为95%），E=3%，p=40%（既往研究中青少年校园欺凌检出率为33.36%[24]），计算出样本量为1024人，进一步设定10%的无应答率和90%的问卷合格率，最终计算出所需最低样本量为1264人。

在浙江省选取两所高校，以班级为单位统一施测，受试者自愿参加并填写问卷，问卷调查使用统一指导语，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师现场答疑。共发放问卷1618份，回收有效问卷1532份，问卷有效率为94.68%。受试者年龄16～24（18.7±0.8）岁；男生745人，女生787人；家庭完整1305人，单亲家庭146人，重组家庭81人。

1.2　工具

1.2.1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epression-anxiety-stress scale，DASS-21）[25]

共21个条目，包含抑郁、焦虑、压力三个维度，测量被试在过去一个星期的感受。量表采用0～3四级计分，总平均分越高表明个体负性情绪程度越严重。将每个分量表的得分乘以2，可以进行程度的划分。抑郁维度：0～9分为正常，10～13分为轻度，14～20分为中度，21～27分为重度，28～42分为非常严重；焦虑维度：0～7分为正常，8～9分为轻度，10～14分为中度，15～19分为重度，20～42分为非常严重；压力维度：0～14分为正常，15～18分为轻度，19～25分为中度，26～33分为重度，34～42分为非常严重。本研究中3个分量表及总量表的Cronbacha’α系数分别为0.881、0.867、0.877、0.953。

1.2.2　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回溯版）（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retrospective version，DBVS-R）[26]

共17个条目，第13条用于考察被试是否觉得自己受到了欺凌，不计入总分。剩余的16个条目分为言语欺凌、身体欺凌、社会/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四个维度。量表采用1～6六级计分。被试在回答每一个题目时需要分别回答小学时、初中时、高中时和大学入学以来的受欺凌情况。该量表各条目得分计四个时段在该条目下的均分，总分计四个时段总分的均值，总均分越高说明个体过往被欺凌的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4个分量表及总量表的Cronbacha’α系数分别为0.916、0.921、0.921、0.966、

0.975。

1.2.3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27]

共10个条目，采用1～5五级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a'α 系数为0.843。

1.2.4 “躺平”量表（“lying flat” tendency scale，LFTS）[28]

共6个条目，采用1～4四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躺平的倾向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5。

1.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 26.0和海因斯（Hayes）开发的Process3.3插件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信度分析、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3个，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量为30.52%，小于40%。因此在本次研究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大学生负性情绪现状分析

1532名大学生中，出现轻度及以上抑郁症状的307人，检出率为20.04%；出现轻度及以上焦虑症状的479人，检出率为31.27%；出现轻度及以上压力症状的205人，检出率为13.38%，如表1所示。

表 1 大学生抑郁、焦虑、压力程度状况［例数（%）］

Table 1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levels of college students

程度	分量表		
	抑郁	焦虑	压力
正常	1225（79.96）	1053（68.73）	1327（86.62）
轻度	112（7.31）	122（7.96）	76（4.96）
中度	134（8.75）	208（13.58）	69（4.50）
重度	32（2.09）	49（3.20）	44（2.87）
非常严重	29（1.89）	100（6.53）	16（1.04）

此外，大学生负性情绪在性别、年龄、生源地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p值均>0.05），仅在家庭结构上存在差异，家庭结构完整的大学生负性情绪显著低于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1.4 ± 0.5）vs.（1.5 ± 0.5）vs.（1.6 ± 0.6），F（1531）=6.95，p<0.001］。

2.3 校园欺凌经历、负性情绪、自尊及“躺平”倾向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2所示，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校园欺凌经历与“躺平”倾向、负性情绪呈正相关，与自尊呈负相关；自尊与“躺平”倾向、负性情绪呈负相关，“躺平”倾向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p值均<0.001）。

表 2 校园欺凌经历、负性情绪、自尊及“躺平”的相关分析（r）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s, self-esteem and “lying flat” tendency (r)

变量	$x \pm s$	校园欺凌经历	自尊	“躺平”倾向
校园欺凌经历	1.27 ± 0.43			
自尊	2.99 ± 0.58	−0.20***		
“躺平”倾向	2.18 ± 0.71	0.20***	−0.36***	
负性情绪	0.41 ± 0.51	0.45***	−0.43***	0.37***

注：*** p<0.001。

2.4 自尊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效应

使用海因斯编制的SPSS宏PROCESS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将校园欺凌经历作为预测变量，自尊作为中介变量，负性情绪作为结果变量，性别、年龄、家庭结构作为控制变量，通过重复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校园欺凌经历对负性情绪有预测作用（β =0.45，t=19.52，p<0.001），放入中介变量自尊后，校园欺凌经历对负性情绪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0.38，t=17.65，p<0.001）。校园欺凌经历对自尊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19，t=−7.60，p<0.001），自尊对负性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 =−0.35，t=−16.46，p<0.001）。此外，校园欺凌经历对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和自尊的中介效应Bootstrap 95%可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如表4所示，表明校园欺凌经历既可以直接预测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又可以间接预测，其中，间接预测是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直接效应（0.38）和中介效应（0.07）分别占总效应（0.45）的84.44%和15.56%。

表 3 负性情绪、校园欺凌经历及自尊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3 The mediating model test of negative emotions,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self-esteem

因变量	自变量	β	SE	t 值	p 值
负性情绪	校园欺凌经历	0.45	0.02	19.52	<0.001
自尊	校园欺凌经历	−0.19	0.02	−7.60	<0.001
负性情绪	校园欺凌经历	0.38	0.02	17.65	<0.001
	自尊	−0.35	0.02	−16.46	<0.001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https://doi.org/10.35534/pc.0611245

表 4　自尊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得分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效应值	95%CI
校园欺凌经历→负性情绪（总效应）	0.45	0.00 ~ 0.01
自尊→负性情绪（中介效应）	0.07	0.05 ~ 0.09
校园欺凌经历→负性情绪（直接效应）	0.38	0.32 ~ 0.44

2.5　“躺平”倾向在校园欺凌经历、负性情绪与自尊间的调节效应

使用SPSS宏PROCESS模型8，在控制性别、年龄、家庭结构的情况下检验“躺平”倾向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5所示，将“躺平”倾向放入模型后，“躺平”倾向显著预测负性情绪（β=0.14，t=8.74，p<0.001），校园欺凌与“躺平”倾向的乘积项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0，t=4.00，p<0.001）。“躺平”倾向显著负向预测自尊（β=–0.27，t=–13.73，p<0.001），校园欺凌经历与“躺平”倾向的乘积项对自尊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9，t=2.46，p<0.001）。说明“躺平”倾向在校园欺凌对负性情绪和自尊的预测中均起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躺平”倾向的调节效应，取“躺平”倾向得分平均数的正负1个标准差作为高、低“躺平”倾向的标准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校园欺凌经历对低“躺平”倾向学生的自尊（simple slope=–0.27，p<0.001）比对高“躺平”倾向学生（simple slope=–0.15，p<0.001）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校园欺凌经历通过自尊影响负性情绪的中介受到“躺平”倾向的调节。对于低“躺平”倾向组的学生，校园欺凌经历通过自尊影响负性情绪的间接效应为0.07，Boot SE=0.02，95%的置信区间为［0.03，0.11］；对于高“躺平”倾向组的学生，该中介效应更小，为0.04，Boot SE=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2，0.07］。

此外，校园欺凌经历对高“躺平”倾向组学生的负性情绪（simple slope=0.45，p<0.001）比对低“躺平”倾向组学生的负性情绪（simple slope=0.30，p<0.001）正向预测作用更强，如图3所示，表明随着躺平倾向的增高，校园欺凌经历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明显增强。

表 5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5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预测变量	方程 1（因变量：自尊）			方程 2（因变量：负性情绪）		
	β	t	95%CI	β	t	95%CI
性别	0.05	1.80	–0.00 ~ 0.10	0.03	1.49	–0.10 ~ 0.07
年龄	0.04	2.30*	0.01 ~ 0.07	0.02	1.94	–0.00 ~ 0.49
家庭结构	–0.03	–1.05	–0.08 ~ 0.02	0.04	2.03*	0.00 ~ 0.08
校园欺凌经历	–0.21	–5.80***	–0.28 ~ –0.14	0.38	13.52***	0.32 ~ 0.43
“躺平”倾向	–0.27	–13.73***	–0.31 ~ –0.23	0.14	8.74***	0.11 ~ 0.17
校园欺凌经历 × “躺平”倾向	0.09	2.45***	0.02 ~ 0.15	0.10	4.00***	0.05 ~ 0.16
自尊				–0.26	–13.31***	–0.30 ~ –0.22
R^2		0.16			0.37	
F		47.14***			12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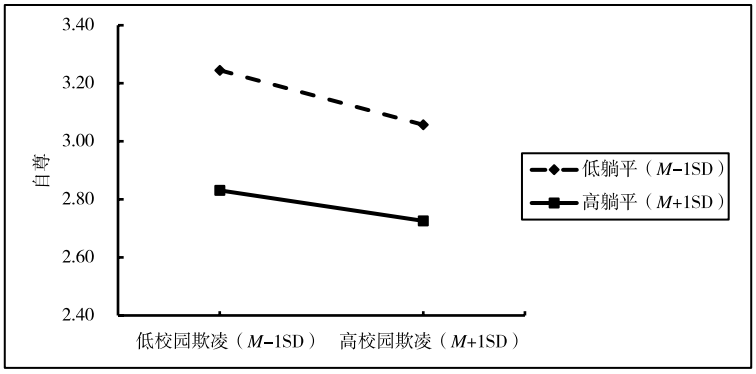

图 2　“躺平”倾向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自尊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ying flat ” tendenc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self-este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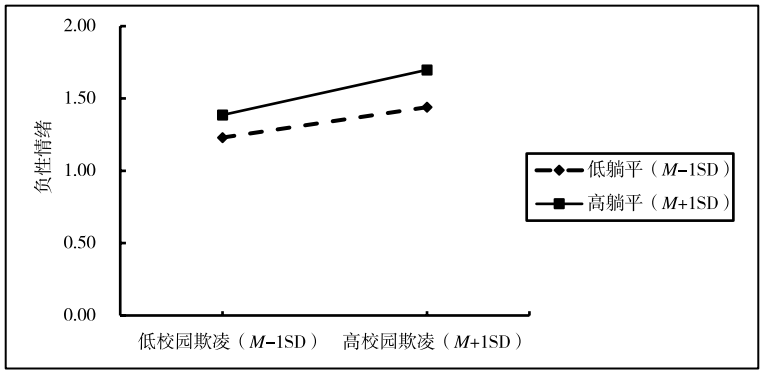

图 3　“躺平”倾向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ying flat” tendenc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3　讨论

首先，本研究结果表明，校园欺凌经历对大学生的负性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假设1成立，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经历过校园欺凌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更容易在情绪调节方面出现困难[8, 9, 13, 14]。贝克（Beck）的认知理论认为，当个体面临压力情境时，与这一情境最相关的图式会被激活，随后会影响个体如何感知、编码和检索有关的情境[29]。校园欺凌作为一种充满压力的生活事件，摧毁了个体稳定、积极的信念系统，诱发了功能性失调的认知信念，从而增加了个体的消极情绪，使易受伤害的青少年面临一系列负面结果的风险[30, 31]。当校园欺凌发生，受害者可能将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归于自己，并认为自己无力改变这一情况[32]。因此，他们可能不会选择去解决问题，而是不断反刍，不断思考负性情绪的原因、意义与后果，沉溺于负性情绪中[33]。

其次，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自尊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校园欺凌经历不仅能直接影响负性情绪，还能通过自尊对负性情绪产生中介作用，证明了研究假设2。校园欺凌的经历可能会使个体激活消极的自我模式，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和自卑感，认为自己被排斥、没有价值和无能[34]。这种低自尊的评价不仅在当下产生，而且能一直延续到成年[14]。而低自尊的个体往往会感到世界充满敌意，倾向于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待各类生活事件和未来，从而产生更多的消极认知和负性情绪[30, 35]。与此相反，高自尊的个体在应对压力事件时更专注于问题的解决，较少产生消极的信念，更容易从负性情绪中恢复过来[36]。本研究中，自尊的中介作用也表明，经历较少校园欺凌的个体自尊水平更高，负性情绪更少；而经历较多校园欺凌的个体自尊水平更低，负性情绪更多。本研究揭示了校园欺凌经历对负性情绪的作用机制，是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和扩展。

最后，本研究还发现，“躺平”不仅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还能调节“校园欺凌经历—自尊—负性情绪”这一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径，研究假设3成立。根据体验回避模型，当个体在遭遇某一事件后产生了消极情绪，那么个体可能会通过实施某种行为来逃避这一情绪体验。因此，个体为了减轻由校园欺凌经历引起的负性情绪会更倾向于通过“躺平”来逃避。但逃避并不能解决真正问题。长时间的“躺平”不利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会使个体产生无意义感，导致个体对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怀疑，从而导致自尊的降低和越来越多的消极情绪[22, 23]。

4　研究价值与局限性

本研究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大学生校园欺凌经历对负性情绪的影响，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和“躺平”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发现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密切相关，提示要在教育工作中进一步关注青少年的校园欺凌问题，加强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此外，降低大学生的“躺平”水平、提升学生的自尊水平有助于缓解校园欺凌经历对负性情绪的影响，从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数据进行测量，调查结果可能受到多方效应的影响。其次，本研究的样本代表存在局限性，被试群体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虑样本的代表性。最后，本研究采用横断设计，无法严格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采用纵向追踪设计，考察各变量的动态变化及其作用机制，从而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5　结论

（1）大学生校园欺凌经历与自尊呈负相关，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

（2）自尊在校园欺凌经历对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

https://doi.org/10.35534/pc.0611245

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躺平”调节了校园欺凌经历与自尊、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Ohayashi H，Yamada S. Psychological distress：symptoms，causes，and coping［M］. 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12.

[2] Ram ó n-Arbu é s E，Gea-Caballero V，Granada-L ó pez J M，et al.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Anxiety and Stress and Their Associated Factors in College Stud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0，17（19）：7001.

[3] Teh C K，Ngo C W，Zulkifli R A B，et al. Depression，Anxiety and Stress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A Cross Sectional Study［J］. Ope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15，5（4）：260-268.

[4] Meeks K，Peak A S，Dreihaus A. Depression，anxiety，and stress among students，faculty，and staff［J］. J Am Coll Health，2023，71（2）：348-354.

[5] Husky M M，Delbasty E，Bitfoi A，et al. Bullying involvement and self-reported mental health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cross Europe［J］. Child Abuse & Neglect，2020（107）：104601.

[6] Ran H，Le Cai，He X，et al. Resilience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self-harm in Chinese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20（277）：115-277.

[7] 孙时进，施泽艺. 校园欺凌的心理因素和治理方法：心理学的视角［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5（2）：51-56.

[8] Fang D，Lu J，Che Y，et al.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associated anxiety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the mediation of resilience［J］.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2022，16（1）：52.

[9] Quintana-Orts C，Rey L，Neto F. Are Loneliness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portant Factors for Adolescents?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Victimisation on Suicidal Ideation［J］.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2021，30（2）：67-74.

[10] Dervishi E. School bullying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J］. Archives of Psychiatry and Psychotherapy，2019，21（2）：48-55.

[11] Nikolaou D. Identifying the effects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on schooling［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2022，40（1）：162-189.

[12] Shayo F K，Lawala P S. Does bullying predict suicidal behaviors among in-school adolescents? A cross-sectional finding from Tanzania as an example of a low-income country［J］. BMC Psychiatry，2019，19（1）：400.

[13] 王澳伦，张天成，徐涛，等. 武陵山区大学生危害健康行为潜在类别及其与校园欺凌的关联［J］. 中国学校卫生，2023，44（5）：751-755.

[14] Valera-Pozo M，Flexas A，Servera M，et al. Long-Term Profiles of Bullying Victims and Aggressors：A Retrospective Study［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1（12）：631276.

[15] Pabian S，Dehue F，Völlink T，et al. Exploring the perceived negative and positive long - term impact of adolescent bullying victimization：A cross - national investigation［J］. Aggressive Behavior，2022，48（2）：205-218.

[16] Tsaousis I. The relationship of self-esteem to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peer victimization among schoolchildren and adolescents：A meta-analytic review［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16（31）：186-199.

[17] Zhong M，Huang X，Huebner E S，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ldren：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21（294）：322-328.

[18] Aboalshamat K，Jawhari A，Alotibi S，et al. Relationship of self-esteem with depression，anxiety，and stress among dental and medical students in Jeddah，Saudi Arabi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edicine and Dentistry，2017，4（2）：61-68.

[19] 熊钰. 网络“躺平”现象与青年奋斗精神培育［J］. 中国青年研究，2022（2）：14-21.

[20] Chapman A L，Gratz K L，Brown M Z. Solving the puzzle of deliberate self-harm：the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J］. Behav Res Ther，2006，44（3）：371-394.

[21] Park C L. Making sense of the meaning literature：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meaning making and its effects on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J］. Psychol Bull，2010，136（2）：257-301.

[22] Lu H，Hou J，Wang J，et al. Antidote or pois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ying flat” tendency and mental health［J］. Applied Psychology：Health and Well-Being，2024，16（4）：1757-1777.

[23] Lu H，Hou J，Huang A，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Lying Flat” Tendency Scale for the Youth［J］. Behavioral Sciences，2023，13

（11）：915.
[24] 姚建龙．防治学生欺凌的中国路径：对近期治理校园欺凌政策之评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36（1）：19–25.
[25] 龚栩，谢熹瑶，徐蕊，等．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DASS–21）在中国大学生中的测试报告［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4）：443–446.
[26] 谢家树，卓杨雪子，程明，等．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回溯版）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3，31（4）：843–848.
[27]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3：250–252.
[28] Lu H，Hou J，Huang A，et al．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Lying Flat" Tendency Scale for the Youth［J］．Behavioral Sciences，2023，13（11）：915.
[29] Wright J H，Beck A T．Cognitive therapy of depression：theory and practice［J］．Hosp Community Psychiatry，1983，34（12）：1119–1127.
[30] Swearer S M，Hymel S．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y of bullying：Moving toward a social–ecological diathesis–stress model．［J］．American Psychologist，2015，70（4）：344–353.
[31] 龚钰涵，叶莹莹，周宵．青少年虐待与忽视对抑郁的影响：自尊和自我表露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4（6）：886–893.
[32] Heinrich L M，Gullone E．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loneliness：a literature review［J］．Clin Psychol Rev，2006，26（6）：695–718.
[33] Li T，Chen B，Li Q，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a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J］．BMC psychiatry，2023，23（1）：1–758.
[34] Extremera N，Quintana–Orts C，Merida–Lopez S，et al．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Self–Esteem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Adolescence：Doe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lay a Buffering Role?［J］．Front Psychol，2018（9）：367.
[35] Mor N，Winquist J．Self–focused attention and negative affect：a meta–analysis［J］．Psychol Bull，2002，128（4）：638–662.
[36] 周宗奎，曹敏，田媛，等．初中生亲子关系与抑郁：自尊和情绪弹性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37（6）：864–87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College Stu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Gan Yulu　Chen Rixin

Zhejia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llege, Zhoush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and related factors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532 college students. They were assessed with the Depression-Anxiety- Stress Scale(DASS-21), 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Retrospective Version(DBVS-R), Self-Esteem Scale(SES), "Lying Flat" Tendency Scale(LFTS). Results: The DBVS-R score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ASS-21 scores . The SES scores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BVS-R scores and DASS-21 scores,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0. 07(95%CI: 0. 05~0. 09, p<0. 001),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14. 58% of the total effect. The LFTS scores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BVS-R scores and both DASS-21 scores and SES scores. Conclusions: Self-Estee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Lying Fla"t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Self-Esteem, negative emotions.

Key words: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s; Self-esteem;"Lying flat"